

浅论马来西亚华巫族群关系的两面性

俞云平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近20年来马来西亚的华巫关系已经走出了严重对抗的局面,逐步过渡到共存共荣的阶段,显示出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竞争与共荣并存的两面性特点。这说明了族群关系从对抗到共荣的过渡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巫族群关系;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 D634.3.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0)01-0036-0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国家,主要有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三大种族集团^①。华巫族群关系一直是该国政治的头号问题,独立初期两族曾发生过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而对于现阶段两族关系的评价,各方也是褒贬不一^②。有的认为两族关系相对和谐,处在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最好的阶段,2001年,马来西亚还获得世界少数民族联盟颁发的首届国际少数民族和谐奖^[1]。而马来西亚著名历史学家邱家金教授在2006年2月接受《新海峡时报》访问时却说,目前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正处于近40年来最脆弱的阶段,国民团结工作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如果政治人物坚持走种族路线,国民团结将遥遥无期。本文则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马来西亚基本上走出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巫两族严重对抗的局面,逐步过渡到各民族互相容忍、共存共荣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华巫关系呈现出矛盾竞争与合作共荣并存的两面性特点,这种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状态是多民族国家族群关系的常态,各民族从对抗向共荣的过渡也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10-02-24

[作者简介] 俞云平(1964—),女,浙江宁海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①按:“种族”一词在马来西亚的使用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与“民族”、“族群”一样的含意。据统计,2004年,以马来人为主的当地原著民占65.7%,华裔占25.4%,印度裔占7.6%,见《南洋商报》2004年12月13日。

②对两族关系较为肯定的可参见:In-Won Hwang: Personalized Political: the Malaysian State under Mahathi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Robert W. Hefner: Introduc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in Ibid., Robert W. Hefner ed.,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林水樑、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1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导言,黄家定:“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政治:在厦门大学的演讲”,《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认为两族和谐还很困难的可参见:John R. Clammer: Ethnic Processes in Urban Malaka, Raymond Lee, eds.,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Detroit, Mich. U.S.A.,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6; 原不二夫著、刘晓民译《马来西亚华人眼中的‘马来西亚民族’》,《南洋资料译丛》2001年第2期;丘光耀《第三条道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选择批判》,雪兰莪:地球村网络有限公司,1997年。

一、近 20 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的调适

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政府于 1991 年公布以新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第二个长期发展计划”,以及“2020 宏愿”,首相马哈蒂尔明确指出,将改变新经济政策,不再无条件地支持马来人在工商业方面的发展。“2020 宏愿”在马来西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受到华人社会的欢迎。新发展政策就是实现“2020 宏愿”的第一阶段。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新发展政策并没有改变新经济政策所要达致的最终目标,但它比新经济政策有所进步,在具体的政策策略上有所调整。比如,虽然马来人占有 30% 公司股权的目标不变,但没有规定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时间,它着重强调应该在“经济增长与平等分配”的原则上进行经济运行,以实现国家的团结与均衡的经济发展。马来领导人试图以更开明开放的态度来改善族群关系,从而调动华人的积极性。在新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下,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府在对待华人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宽松的政策,对华巫族群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政府继续倡导华巫经济合作。从 1991 年开始,土著经济大会常常邀请华人企业家参加,共商合作大计。政府还重新界定土著企业的定义,即土著占有 35% 股权的企业便属于土著企业,而过去必须是土著占有 51% 以上股权的企业才能被划为土著企业。今年 4 月,新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宣布废除服务业 27 个次领域的 30% 土著股权限制,包括卫生与社会、交通运输、旅游、商业、电脑科技等相关服务领域,让市场逐步自由化。此举受到朝野政党与学者的普遍欢迎^[2]。

在文化教育方面,虽然华文教育的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华人文化仍然面临被同化的处境,但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表示不打算取消华文教育,在多种场合肯定华文教育在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人才方面做出的贡献。政府还鼓励马来学童、大学生、公务员学习华文。90 年代,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等一批华文大专院校相继建立。政府对华人文化的排斥态度也有所缓和,比如舞狮不但获得批准,而且被列为国庆日游行的项目之一。

在国家效忠以及对华人的评价,政府也表现出较为信任与肯定的态度,像 80 年代那样公开质疑华人投资中国是不效忠国家的批评已很少,转而鼓励包括华人在内的马来西亚企业家投资中国。在 2003 年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开幕式上,马哈蒂尔指出,埋头苦干、创业才干、艰苦奋斗是华人成功的要素,肯定了华人为所在国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也肯定了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互相协作^[3]。今年 4 月,纳吉拜访《星洲日报》总社时强调,他所提倡“全民的马来西亚”(One Malaysia)概念,就是肯定各族,包括华社在建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我要感谢华社对国家建设所作出的许多贡献,过去和现在,马来西亚华社对国家建设所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将来也是如此。”为拉近与华社的距离,纳吉的博客也将推出华文版^[4]。

近 20 年来华人政策的放宽,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的。

首先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马来人已经牢固地控制了政权,非马来人政党在国民阵线中的权力地位较之于原先的马华印联盟(它“基本上是建立在‘给予和获取’政策和‘公平交易’原则上的”)是大大降低了,其身份不再是“交易”的一方,而更像是“老板”手下的“伙计”^[5]。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巫统内部之争愈演愈烈,1989 年 11 月,挑战马哈蒂尔领导权失败的拉扎利·哈姆扎另组“四六精神党”,之后又联合民主行动党(主要的华人反对党)、人民党、沙巴团结党等,组成“人民力量阵线”,给执政的国阵造成巨大的威胁。华人选票一时成为执政党和反对党竞相争取的对象。巫统党争与对新经济政策的检讨发生在同一年,恐怕不是巧合。执政党转而对华人采取较为温和、稳健的政策,有限度地放宽对华人的限制,显然是担心大选中的华人选票流向反对党联盟。例如马哈蒂尔曾说,政府不会任意去消灭华小,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华社选择了错误的政府,那么国阵将变得无能为力,也就无法坚持“不关闭华小”的承诺。这其中,拉华人选票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其次是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扶持,马来人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华巫经济差距已大大缩小,马来人的持股率已从 1970 年的 2.4% 上升到 1990 年的 20% 左右,如果加上“土著信托基金”所托管的部分,则已达到 30% 左右。在设计师、会计师、医师等收入较高的从业人员中,马来人所占比例已达

40%以上^[6]。在金融系统,马来资本更占据主导地位。而新经济政策对马来人利益的过分维护,公开或非公开地排斥非马来人,极大地伤害了华族民众的感情^①,打击了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因而需要转而安抚华人、调整华人政策,改善族群关系。而马来西亚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已经使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华人在经营管理、积累财富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仍然存在,充分调动华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马来西亚经济的繁荣。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华人的商业网络、经营才能更显得重要。马哈蒂尔在2000年向马来青年专业人士大会致词时指出,华人经商致富并非靠骗术,而是勤奋吃苦、积极学习所得,马来人必须学习这种态度与精神,否则将陷入无法自立的困境^[7]。

再次是华人社会长期的抗争。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组织比较完备,既有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民政党等政党,也有中华大会堂总会、董总、教总,以及各类同乡会、宗亲会等民间组织。它们都在以各种方式争取华人社会的权利。当正面推动无效时,从反面施压也是华社的选项。在1990年的大选中,国阵遭到了来自反对党联盟的严重威胁,虽然成功地保住了国会中的2/3优势,但所获席位和得票率均为历年最低,马华公会与民政党拥有的华人选票持续流失。华人利用现有的民主政治体制,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地位,但也可以促使政府检讨其华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华人的处境^[7]。

最后是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随着冷战的趋缓,中马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再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华人问题的敏感度降低。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许多商机,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文化交流增多,中马双边关系也不断推进,各个领域的合作广泛开展,不但提升了中文的实用价值,而且使华人的沟通和先导作用更显重要。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马来西亚国内的华人政策。

二、矛盾竞争与合作共荣:华巫关系的两面性

随着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的趋于宽松,华巫两个民族的关系逐渐朝着各民族互相容忍、共存共荣的方向迈进,体现出矛盾竞争与合作共荣的两面性特征。

在经济方面,华巫经济合作已经从政府行政干预下的合作逐步向自愿组合转化,从“阿里巴巴”式的合作,向共同出资、共负盈亏、自愿真诚的合作转化,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华裔蔡马友与马来人拉昔胡申合作创办的“拉昔胡申有限公司”,马来人伊苏汀与华资商联控股联营地产业,建立了聂慕尼控股公司,等等。虽然华巫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两族人士能在一起共同商讨问题,带来了一股种族融洽的气氛,有利于化解彼此间的隔阂^[8]。在文化方面,华人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全体民众所接受,“马来西亚旅游年”的亮点之一就是展演华人的传统文化,国家语文出版局率先出版《论语》、《孟子》的马来文译本,公开宣称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可融合之处。

华人社会对国阵政府各项政策的认同也在9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995年大选,华人选民全力支持执政党,国民阵线不仅赢得优势继续执政,而且创下了自执政以来的最高支持率。1999年大选,在华人经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华人仍然投票支持国阵政府。而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却在这两次大选中失去了大部分华人的选票,反映出华人选民的选票投向主要依据各政党之现行政策而非其种族构成,显示出族群政治色彩的弱化。而在2008年3月的大选中,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组成的反对党联盟一举获得82个国会议席,还夺得檳城、雪兰莪、霹雳、吉兰丹、吉打五个州的执政权,反对党能取胜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跨种族的竞选宣言,关注民生问题,淡化种族问题和宗教争议,因此不但有许多非马来人投票给公正党和回教党,也有相当部分马来人投票给民主行动党。而国阵虽然在222个国会议席中获140席继续执政,但首次失去2/3多数议席的优势。但是,应该看到,种族政治、种族思维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民众投票给反对党的原因之一也是想借此表达对经济低迷、贪污腐败等现象的不满,种族因素仍然将制约着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事实表明,华巫两族共存共荣的关系仍相当脆弱,远未达到稳固融洽的境界。马来人主导下的政府继

① 华人普遍表达出“如果土地不承认他们的儿女,如何倾注心中的爱”的苦闷心情,参见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第221-227页。

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制华人,而华人社会也不断地发出要求公正平等的呼声,例如1999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大选诉求》得到2000多个华人社团的签名支持。而马来人则开展反诉求行动,2001年2月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不会在世界消失”的马来人团结大会。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双方达成和解。虽然双方的争执反映了仍然存在的种族矛盾,但毕竟能得到理智的化解,说明两族关系虽然尚不稳固,但还是比以前有所改善。

200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也形象地体现出马来西亚种族关系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受访的各族人士普遍认为现阶段的种族关系融洽,以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为自豪,对前景抱有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人们对种族仍有刻板印象,半数人不信任其他种族,63%的华族、43%的印度族和58%的马来族都认为,大多数马来族“懒惰”,71%的马来族、47%的印度族和60%的华族都认为,大多数华族“贪心”,64%的马来族、58%的华族以及20%的印度族认为,大多数印度族“不可靠”。负责调查的专家指出,目前的种族交流主要体现在商业和政府事务方面,实质性的交流还不是很多,各族之间互不信任的状态有待改变^[9]。

归根结底,华巫两族的主要矛盾还是围绕着公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虽然已经进入了新发展政策时期,但是新经济政策的精神一直被延续下来,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新国家发展计划虽然充满了美丽的词藻,却没有改变第一个长期发展计划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它的政策目标仍然是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消灭社会贫困与社会改组,所谓‘平等’就是‘种族间的平等’,所谓‘公正’就是‘种族间的公正’;人才培养的重点也是原住民人才的培养,增强民间的活力,也是支持原住民企业家的经营能力。”^[10]关于是否应该坚持新经济政策精神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历届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延续新经济政策精神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如2005年的大会上,巫统青年团的高层领导甚至直接提出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建议,引起华人社会的强烈不安。

那么,新经济政策关于土著拥有30%股权的目标是否已达到?政府在2004年公布,土著拥有股权只占18.9%。然而,2006年10月,马来西亚亚洲策略研究院属下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企业股权分配:过往的趋势与未来的政策》的研究报告,指出土著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已达到45%。报告一经公布,立即招致巫统政要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该研究中心把占有股市1/3市场价值的政府关联公司列为土著公司是完全错误的,关联公司由政府控制,是全民拥有的资产。结果,亚洲策略研究院主席米尔占·马哈迪宣布收回这项研究报告^①。11月,副财政部长在回答议员提问时也提到,2005年土著占有上市公司36.64%股权,但首相署随即发表文告说,土著的企业股权占有率是18.9%,并不是36.64%^[11]。许多华人认为,如果按照将政府关联公司排除在外的计算方法,新经济政策关于土著股权达到30%的目标,其实现将遥遥无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土著将已获得的股权卖掉,使得本已增长的土著股权比例又趋下降。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按照规定,上市公司须保留30%股权给马来人或土著,然而,不少马来人或土著往往在分配到有关股份之后,很快就转手卖掉套现。只‘拿’不‘持’,马来人或土著持有30%股权的目标,岂非越来越遥不可及?”^[12]这又牵涉到马来人是应该继续受到政府的优惠和照顾,还是应该培养自己的竞争力这样一个问题。

显然,马来领导人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在2004年9月召开的巫统第55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首相阿都拉劝告马来人勇敢地丢掉“拐杖”,不要一直依赖政府推行的扶助政策,“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马来人将会变得更加软弱,继续依赖‘拐杖’的后果是更不能行走,最终可能要坐轮椅。”他还说,马来人的力量不能够只来自政治力量,如果马来人在掌握知识、技能、经济、社会和科技的根基不强,政治力量就无法持久^[13]。阿都拉继马哈蒂尔之后在公开场合批评马来人缺乏竞争力,表明马来领导人已开始认识到,马来人经济地位的软弱也要从自身的不足当中寻找原因。与以前一味指责别的民族相比,马来领导人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有利于种族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①杨凯斌:《股权争议:19%或45%?》,转贴自《当今大马》2006年10月9日;佚名:《“社教教育问题应跨越政治”董教总:监督施政是人民权利》,转贴自《独立新闻在线》2006年10月17日。以上两条均采自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网站,2006年10月。

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华巫两族关系表现出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矛盾摩擦不断,另一方面交流合作加强,既有互相指责,又有容忍让步,竞争与共荣并存。这说明,从对抗到共荣的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且时有反复的过程。

三、华巫族群关系的走向

在马来西亚,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华巫两族的矛盾,其由来已久且将继续存在。而其复杂之处在于阶级矛盾往往从属于种族矛盾,从而掩盖了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本质关系。归根结底,各社会集团“所处的情势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地位”^[14]。在某些情况下,同属一个阶级但分属不同种族集团的人们可以联合起来,如华巫印联盟和国民阵线。在另一些情况下,同样归属的人们却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如马来族工人阶级和华族工人阶级。二者的不同便是阶级地位使然。前者的联合是由于他们处于支配的地位,后者的分裂则是由于他们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马来贵族官僚和小资产阶级……能够把马来无产阶级和大量涌入城市而在同此过程中又为占支配地位的非马来人所压倒的马来游民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激发起来”^[15]。所以阶级矛盾往往以种族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

与阶级归属相比较,民族归属较有稳定性。民族特征主要取决于文化(广义的文化),阶级特征主要取决于经济(经济地位),因此民族归属主要视文化变化而变化,阶级归属则主要视经济变化而变化。文化变迁较经济变动为慢,故民族属性较阶级属性更为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民族矛盾往往能掩盖阶级矛盾。在马来半岛农村进行了两年(1978~1980)田野调查的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对其生活过的吉打州塞达卡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提到了一个马来大地产者兼高利贷者哈吉·布鲁姆,其中牵涉到华人。“村民说,这些借贷中的一部分是二手的,即哈吉·布鲁姆从大的华裔放贷者那里以40%的利息贷款,再以80%的利息放贷给农民,从中赚取差价。在这些村民看来,他与镇上的华裔债主密切合作这一事实,要比自己单独放贷更加违反伊斯兰的律令”。因为华人放贷就其自身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是“正常的商业活动”,而马来人放贷则是《古兰经》明确禁止的^[16]。从这一事例中人们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马来政客可以轻而易举地煽起民族对立情绪,从而也就会明了消除文化隔阂实际上是华巫两族关系和谐的最要紧之处。

华巫两族关系的发展,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同时并存。

就有利条件而言,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已是客观现实,长期共处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让各民族逐步认识到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而且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民族的政治精英之间经过多年的磨合,已具有一定的相互适应的能力。这就为“共赢”创造了良好条件。再者,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马来西亚的政党、议会、选举制度,表达言论和自愿结社的制度等,虽然与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还有距离,但毕竟为各族人民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各民族的利益是通过各种合法的政党、团体、传媒去呼吁,通过协商去争取的。2008年大选后由民行党、公正党和回教党联合组成的民联,最近拟出八大纲领,交代未来的粗略方针,除了立志成为种族政治和歧视性政策的终结者,还决意秉承法制原则、打击贪污、还原联邦制、废除《内安法令》、制定社会保护议程等^[17],多少让人们感受到“两党制”(“两线制”)的雏形。

就不利条件而言,现行的宪法和选举制度对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马来人仍然把华人看成是外来者,认为华人必须承认马来人的主导性,不容许质疑马来人的特权,华人对此也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的。尤其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华人,他们并非外来移民,又为民主平等观念所熏陶,更是难以从心底里接受马来人的特权。然而,马来人本身似乎以拥有特权为理所当然。这就造成了相互之间难于克服的矛盾。从华人内部来讲,他们并非铁板一块而时有分歧,政治上也不统一,难于用一个声音来维护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再者,华人人口比例持续下降,2005年已降至25%左右。在此情况下,“华人的地位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许会出现变化”,亦即会失去左右政局的力量^[18]。从华人内部来看,2008年的大选表明,华人社会进一步分裂,马华公会从上届的31个国席76个州席,下跌至本届的15个国席32个州席,民政党则几乎全军覆没。华基政党在执政党内地位的进一步下降,有可能削弱华人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决策方面的影响力。

虽然民主行动党获得 28 国席 73 州席的好成绩,夺得槟州执政权,但一个少数族裔为主的在野党对现行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有限。而且,它与其他两党、特别是回教党的最终目标有较大的差距,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是对立的,它能在民联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三党可以在怎样的限度内维持合作,都是令人担忧的^①。从马来人内部来讲,反对党伊斯兰教党时时对巫统产生威胁,马来人贫富差距扩大的严酷事实增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群众基础,巫统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出现许多伊斯兰化的倾向^[19]。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情况,有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居心不良的政客利用阶级矛盾来挑起种族矛盾并以后者掩盖前者;一是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客观现实被忽视从而使维系社会稳定的支柱受到削弱。而无论哪种后果出现,都会对华巫两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但无论如何,包括华巫两族关系在内的马来西亚民族关系毕竟是东南亚各国中较为和谐的。展望未来,民族关系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仍具有很大可能性。对马来人及其主导的政府来说,必须倡导协调与妥协,为了共同的利益,寻求彼此可以接受的方式和途径来解决民族问题,以此降低非马来人的相对被剥夺感,而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或者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华人来说,在现行的政治框架之下,华人的地位较难改变,多元种族平等相处理想的实现尚待时日,必须认识到华巫两族矛盾的长期性,在据理力争中需要耐心并讲究策略。然而,共存共荣有利于各个民族,这是各民族利益的契合点,有了这一共同的出发点,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就有希望维持和谐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南洋商报,2001-03-21.
- [2] 废除 27 领域土著股权限制 朝野学者主张应全面开放[EB/OL]. [马] <http://www.merdeka.com/news/n/9443.html>, 2009-04-23.
- [3] 海外华人为所在国发展作出贡献,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吉隆坡隆重开幕,马哈蒂尔发表讲话[Z].华侨华人资料, 2003 (5) 30.
- [4] 赞扬华社对国家建设贡献 纳吉誓言捍卫所有人利益[EB/OL]. <http://www.zaobao.com/yx/yx090401>
- [5]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56,157.
- [6] 陈晓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62.
- [7] 马哈地告诫马来人必须学习华人精神[A].华侨华人资料,2000 (2) 36;华商可成为马来人典范[Z].华侨华人资料, 2000 (4) 24.
- [8] 廖小健.谈马华经济合作[J].八桂侨史,1996 (2).
- [9] “We are united, feel proud and lucky but...”, New Straits Time, 20 March 2006, Column 8.
- [10] [日]山下彰一.马来西亚新国家发展政策的概要与各种课题[J].汪慕恒译,南洋资料译丛,1994 (1-2) 58.
- [11] 庄迪澎.“土著企业股权只有 18.9%”首相署推翻副财长 36.64%说法[EB/OL].[马]独立新闻在线,2006-11-13.
- [12] 巫统大会精彩依旧 马来人路在何方?[EB/OL].www.asia1.com.sg/zaobao/, 2004-09-26.
- [13] 阿都拉.面对全球化竞争马来人须丢掉“拐杖”[EB/OL].www.asia1.com.sg/zaobao/, 2004-09-24.
- [14] [英] 约·雷克斯.阶级分析和种族关系——种族关系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原理[C].刘兴武译,种族问题国际会议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83.
- [15] [马] 林马辉.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下)[J].陈家屯译,南洋资料译丛,1987 (2) 83.
- [16] [美] 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15.
- [17] 立志终结种族政治 民联颁布八大政纲[EB/OL].[马]独立新闻在线,2009-12-17.
- [18] 黄家定.人口比率逐年下降 华人地位起变化[Z].华侨华人资料,2001 (2) 1.
- [19] [马]陈中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M].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联合出版,2006:183-186.

①比如民行党在霹雳州虽然夺得议席最多,但华人并不能担任州务大臣,民行党也就无法在州政府中居主导地位,引起部分华人的不满。相关报道见《南洋商报》2008年3月11—15日A版。2009年2月,国阵策动民联议员脱离民联,重夺霹雳州政权。相关报道见2009年2月马来西亚各大报刊。